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戰後“中”日經濟與政治互動關係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RC and Japan Since 1949

doi:10.30390/ISC.199705_36(5).0003

問題與研究, 36(5), 1997

Issues & Studies, 36(5), 1997

作者/Author：石原忠浩(Tadahiro Ishihara)

頁數/Page：33-5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5_36\(5\).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5_36(5).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戰後「中」日經濟與政治 互動關係*

石原忠浩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摘 要

在今年迎接「正常化」二十五年的中共和日本的關係，雖然歷經各種波折，但大體上達成了順利地發展。

本文回溯中共和日本關係的演變，區分為：一、戰後的初期，即中共建政後以及「中」日無邦交時期的一九四九～七一年；二、正常化後各種交流擴大期的一九七二～八八年；三、進入後冷戰時期等三個時期，以此回顧及探討各個時期的政經關係的特性，分析日本的對中共經濟合作與政治關係的關聯性以及其運作情形。

最後，進入後冷戰期的現在，鑑於「中」日兩國相對的總合國力的提昇，展望理想的將來的雙方關係。

關鍵詞：「中」日關係、經濟策略術、政治與經濟的關聯、援助政策

* * *

壹、前 言

由於田中角榮強烈的意志，以及日本官民「中」日友好的大力聲援與周恩來的「求同存異」精神之下，緊急完成的「中」日正常化，在一九九七年九月迎接「中」日復交二十五周年。這二十五年之間，「中」日之間的各種交流呈現的是穩健的增加現象。

不過這二十五年間的數字上的增加並不意味著兩國之間沒有發生任何的摩擦、衝突。假如一九七二年的正常化是「中」日交流的正式開始，周、毛的過世、四人幫的倒台以及文革的結束、華國鋒體制時期則是下一時期的助跑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路線的開始以及鄧小平時代的建立後，「中」日關係即邁向新的時代。「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後，接著日方開始對中共的經濟援助，首先以貿易為首，後來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也不斷地增加。另外「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等的歷史問題、「光華寮」事件等的台灣問題也陸續發生。

* 本文蒙政治大學政治學系郭承天教授提供寶貴建議，謹此致謝。

進入後冷戰時期的九〇年代，雖然歷史上首次的日本天皇訪「華」象徵了「中」日友好，但是隨著核子試爆、「中」美及兩岸關係惡化等產生的負面影響，「中」日關係不得已陷入了不圓滑的狀態。不過雖然政治關係的風波不斷，貿易額仍然持續地增加，這意味的是雖然雙方之間夾雜著內外的矛盾以及潛在的爭論點，但是雙方仍在默許之下進行「中」日互相依賴關係。

這篇文章是以戰後的「中」日關係為主，描述「中」日政治以及經濟關係的演變並探討其關聯性。第二章首先解釋經濟與政治的關聯性，內容包含了以政治、外交手段的經濟政策，以及最近學者矚目的日本的援助政策。第三章包括建交之前的「中」日政、經互動關係的演變。第四章是對第三章演變的分析，第五章則為結論與展望。

貳、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

一、政治與經濟的關聯性

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是國際關係的研究分野中陳舊的主題。不過二十世紀學術界的主流傾向於把政治理論與經濟理論分離開來加以分析。^①造成政治學與經濟學學術上的斷絕，原因之一無非是自由經濟主義派的存在。依據自由主義者的理論，經濟的體系是由在自然的法則基礎下的財產、服務之生產、分配以及消費所形成。因此自然的法則與經濟原理之間存在著協調關係，而且他們主張政治權力最小時，這種所謂的「自然的協調」達到高峰，故為所有的人帶來經濟利益的主角不是政府的領域，而是民間的領域，進而在自由貿易的自然、協調性的過程不但帶來了繁榮而且也帶來和平。

國際政治學中分析經濟與政治相互關係的研究一直在檢證經濟的現實面形成政治的方式。在歷史上，十九世紀的英國早期達成產業化，其產業化造就了英國的財富、霸權，創造了大英帝國所支配的國際經濟、政治結構。二十世紀的美國，其政、軍方面的優越性也同樣地以壓倒性的經濟力量為強大後盾，再如冷戰後的日本、德國的政治大國化與假想軍事大國化的「中國威脅論」，也是以日、德、中的經濟發展為背景的爭論。相反地，由政治因素所創造出的經濟的結果也是事實。如前蘇聯所建立的COMECON（經濟相互援助會議），因為政治的理由使東歐兄弟之邦從屬蘇聯，而孤立於歐美經濟之外。

另外隨著這二十年來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其中日本、星、韓、台的發展模式尤其受到世界的關注。因為這些國家雖然程度不同（如通貨膨脹政策、總體經濟的經營、培養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國內的產業等），都有國家對經濟政策的干涉。^②雖然國家

註① 參閱 Joan E.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5), Chap. 1.

註②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3~16.

對經濟政策的干涉並不是唯一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不過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證明了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關係。

二、經濟策略術 (Economic Statecraft)

在歷史上不少的國家試以經濟的手段來達成外交上、政治上的目標。十九世紀的拿破崙對英國施行禁運，二十世紀導致了空前的災害的美日戰爭（原因是美國、英國、中國、荷蘭的 ABCD 包圍網對日本戰略物質的禁運）。回顧現代的國際社會裡制裁的事件不斷地出現，如天安門事件後的對中共經濟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後的對伊國制裁（後來成爲軍事制裁），讓人們記憶猶新。

Albert Hirschman 提出的 Economic Statecraft 理論研究，學者們紛紛加以分析、試驗。所謂經濟策略術 (Economic Statecraft)，即國家或者國家組織以經濟效力的手段來達成外交政策的目標。經濟外交的目標很廣泛，大體上可歸納爲：③(-)改變目標國 (Target Country) 的某些行爲〔這些行爲是施予國 (Sender Country) 認爲不適當的行爲〕，如抑制人權、對其他國家的軍事侵略等；(-)以目標國的政治領導、政治體制、軍事能力的改變爲目標，如歐美國家對非民主國家、共產主義國家施以制裁；(-)因應國內政治的要求，如抑制進口、美國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等；(-)國際的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的目標，如反共、反恐怖主義同盟的結合、擴大等。

學者們又將經濟外交區分爲「施壓性的策略術」(Coercion Statecraft) 和「交易性的策略術」(Exchange Statecraft)。「施壓性的策略術」是施予國以本身沒有虧損的方法（如：對目標國貸款凍結等）對待目標國，施予國期待目標國爲了避免經濟上的打擊而改變其對施予國的某些行爲。④換言之，施予國沒有提供經濟的代價而得到政治的利益或政治上的讓步。「交易性的策略術」是包括資本的移轉，施予國對目標國優待的待遇，如低關稅率、低匯率貸款等，換言之「交易性的策略術」的運用，是立基於施予國願意放棄目前對經濟商品（例：援助等）的消費以換取目標國外交政策的讓步的假設上。

Von Amerongen 描述經濟策略術似乎如同「被拔掉指甲、牙齒的老虎只能小聲地吼叫」。⑤根據其他對 Economic Statecraft 的試驗的研究，⑥可以歸納出以下的結論：施予國的施壓策略術對目標國的行爲變化沒有重要的打擊影響，反而交易策略術會爲施予國帶來好處。同時對目標國而言，接受交易政策甚於施壓政策。

註③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Chap. II .

註④ Cheng-tian Kuo, " Economic Statecraf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1993), Vol. 29, No. 10, pp. 21~23.

註⑤ 參閱 Otto Wollff von Amerongen, " Economic Sanctions as a Foreign Policy Tool ?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ssachusetts), Vol. 5, No. 2 (1980), pp. 159~168.

註⑥ Cheng-tian Kuo, " Coercion and Exchange in Economic Statecraft, "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2 (June 1994), pp. 96~99.

最後，交易政策的成功率也並不很高，要在附加某些條件之下使用才有效，也就是說施予國的外交目標適當，而且與其他的外交政策的工具（包括政治、軍事）一起使用時才會有效。

三、日本的援助政策原則

在討論日本的援助政策原則之前，先探討援助政策與經濟策略術的關係。經濟援助能夠達成哪些政治、外交目的呢？依據 Klaus Knorr 的研究主張，在短期內可期待的政治、軍事方面的利益有以下六點：⑦

- (一)可作為對抗各國以及施展其政治的影響力的手段，容易獲得、維持軍事同盟國或分裂敵對國家的同盟關係。
- (二)維持與受援助國家的關係。
- (三)對有政治、軍事上價值的政府所遭受的經濟的、國內外的壓力給予支援。
- (四)改善、維持援助提供國的軍事安全保障。
- (五)表示其對世界上的貧困國家的關心，可提昇援助提供國的形象。
- (六)向受援助國家示意其和第三國家的政治的明確態度。

進入日本經濟規模全球化的一九八〇年代，日本以龐大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為代表的援助政策，受到各界的注目。解釋「中」日經濟關係的重要事項之一，即為與對中共貸款問題有關的日本的援助政策，在此以歷史的演變、理念、特徵三點來探討。

依據 Brooks 與 Orr 的研究，戰後日本的援助政策可分為四個階段：⑧(一)一九五〇年代初～六〇年代中期，這時期的援助帶著濃厚的戰爭賠償的色彩。⑨一九六五年經過長期的談判之下達成「日韓正常化」時，日方向韓方提出五億美元的貸款是代表性的事件。(二)五〇年代中期～七〇年代：以輸出振興為手段的附帶條件的貸款援助；(三)一九七〇年代：集中於與資源豐碩的諸國建立經濟相互依賴關係的援助；(四)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降：對貧困國家以及戰略上重要的國家的援助。

最後，進入後冷戰期的日本九〇年代的政策可由九一年四月在國會提出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裡反映，其要旨為：⑩

(一)環境與開發並重；(二)避免用於軍事及助長國際紛爭；(三)維持並強化國際和平安全，對開發中國家的軍事支出，大規模破壞兵器、飛彈的開發製造及武器輸出等與密切的關係；(四)關注開發中國家之民主化，致力導入市場經濟，保障基本的人權及自由。

五〇年代～七〇年代初期的援助是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占領地區的賠償

註⑦ Klaus. Knorr, *The Power of Na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 1975), pp. 169-170.

註⑧ William. L. Brooks and Robert. Orr, Jr., "Japan's Foreign Economic As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 25, No. 3 (March 1985), P. 323.

註⑨ 日本的經濟援助是以一九五〇年代對亞洲諸國的戰爭賠償和經濟合作協定為開始。

註⑩ 朝日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二日，版二。

及輸出振興為目標，所以援助集中於亞洲地區。接著，面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為了推動尋找資源供給國的多元化，援助的對象則擴大到中南美、中東地域。七〇年代後期以降，隨著日本的經濟大國化，產生了不僅對於亞洲地區而且對於世界情勢的關心的認識，在冷戰後則對世界的共識事項如「民主化」、「人權」等世界的問題開始關心。

對經濟援助理論化是困難的，加上日本援助政策的範圍只有經濟援助，^①與使用「經濟援助」、「安全保障關聯援助」、「軍事援助」等方式的美國相較起來，日方的援助理念可歸納出兩項基礎：「互相依賴的認識」與「人道關懷」。^②依據官方的說法，日本對援助的理念可歸納如下：^③

(一)日本的經濟協力基本概念是「南北國家之間互相依賴性的認識」。因對存在著市場、資源限制問題的日本而言，需要跟開發中國家聯結政、經上的緊密的互賴關係。而從日本的經濟安全保證的角度來看，考慮促進輸出、確保資源等等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趨勢決定對外援助的方向。故重視亞洲的戰略是必然的。

(二)歐美諸國對開發中國家的援助，因強調人道的因素，是單向的提供，再者「互相依賴性的認識」援助理念立場的日本，它的對外援助是根據該國的努力來支援其產業的現代化。故有日本 ODA 的「請求主義」和「有償資金協力」^④結合。

(三)鑑於從明治維新時期以來政府主導型工業化的經驗，日本政府相信政府跟民間角色有機的結合才能實現有效率的工業化。故日本 ODA 的重點是放在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

其實日本政府雖然傾向於強調互相依賴的認識、人道關懷這兩項基礎，但對於以援助中共為首，諸如向蘇聯侵入阿富汗時的巴基斯坦、柬埔寨內戰時的泰國、波斯灣戰爭時的灣岸周邊諸國提供的援助，無非是考慮戰略的總合安全保障的一貫政策。

在數字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援助大國，卻一直受到內外的批評。例如：馬可仕在位時期的對菲援助，只使他們一族享受利益，加強其獨裁政治，使人民受更大的痛苦。另外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日本馬上著手對「中」關係的改善，解除對「中」援助凍結等的這種行為受到西方國家的批評，日本即使提出 ODA 四原則，「一九九三

註① Dennis T. Yasutomo, 渡邊昭夫監譯, 戰略援助と日本外交 (東京: 同文館, 一九八九年), 頁一四六~一四七。

註② 通口貞夫, 政府開發援助, 第二版 (東京: 勁草書房, 一九九一年), 頁一四三。

註③ 中國研究所編, 中國年鑑一九九二年版別冊, 對中經濟技術協力的所有 (東京: 大修館, 一九九二年), 頁五。

註④ 「請求主義」(日文為「要請主義」)是日本援助的形式之一,日本對受援助國家提出的具體計畫(如:水力水庫、鐵路建設等的請求)給予援助。這意味著日本不願意援助不明確目的的援助請求。所謂具體的計畫是由在受援助國家活動的日本企業尋找「Project(計畫)」,向該國提出建議、提案,再由該國家向日本申請計畫書。「有償資金合作」對歐美而言,其援助觀念是富者施捨錢財給窮人以及企圖維持政治的影響力;而日本則是以「自力更生」的觀念。雖然美國的豐碩資金援助是戰後日本經濟「奇蹟」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日本人更相信是本身的努力,故日本的對外援助的基礎不是「施捨」精神,而是以受援助國家經濟發展為目標。

年之前，日本曾經沒關注人權問題與援助的聯繫」。^⑥Sato 所強調的一九九三年可能和美國柯林頓的對「中」政策有關，柯林頓本來主張對中共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掛勾（後來放棄），日本於是不得不也考慮人權與援助的聯繫。

談到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外交，鑑於憲法上的限制和輿論的分裂的情況，邁向政治大國時，日本的援助政策是較易被國內外輿論接受的策略，所以這是日本短期未來的外交政策中心的主流。

叁、「中」日經貿、政治關係的演變

戰後的「中」日關係深受美國的意向影響，舊金山條約後日本選擇的不是在內戰勝利的中共政府，而是被打敗的國民政府。東京與台北的同盟關係，讓北京相信日本加入美國所推動的全球性反共政策。不過「中」日雙方基於經濟的需要而開始的民間貿易，是在華盛頓、台北的監視之下歷經波折而穩定、踏實地成長。進入一九七〇年代，反共鬥士尼克森總統訪「中」後，被解放腳鐐的「中」日關係一股作氣地突進「正常化」。同時與台北不得已斷交，不過在雙方的努力之下維持實務關係。「正常化」後的「中」日關係一方面以經貿為主的各種交流一直擴大，一方面歷史問題、台灣問題等的摩擦也不斷地發生。

進入後冷戰時期，一方面仍然繼續各界的交流，深化互相依賴關係，另一方面除了歷史、台灣等的「老問題」以外，如日本的政治大國化、中共的經濟大國化等與「中」日正常化時（冷戰時期的「中」日基本關係為政治大國的中共，經濟強國日本）角色不同的情況逐漸出現，而且因為中共進入後鄧小平時期，日本也陷入「政界再重組」，所以雙方無法提出將來的展望。

在這裡將「中」日政經關係的演變分為三個時期：一、「中」日無邦交時期的一九四九～七一年，二、正常化後的一九七二～一九八〇年，三、後冷戰時期的一九八九年迄今加以分析。

一、一九四九～七一年：「中」日無邦交時期

欲了解戰後「中」日關係的展開，必須先了解當時的國際關係。在一九四六年陷入國共內戰的大陸，以美國為後盾的國軍自一九四八年開始敗走，繼續快速進擊的中共一九四九年七月宣布「蘇聯一邊倒」，經過十月一日的「建國」，一九五〇年二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後，締結以日美為假想敵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明示其為反資本主義陣營的成員。再者隨著韓戰的爆發，美國取消一九四九年七月的對中國內政不介入宣言，決定派遣第七艦隊關心台海動態，中共認為「中美之間台灣問題」的發生是

註⑥ Yasunobu Sato, "New Directions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Asia -ODA Perspective," in Edward Friedman, ed., *The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p. 107.

由於美國「台灣海峽中立化」的宣布，^⑥之後中美雙方都介入韓戰而造成了在亞洲的「中」美對立。身為戰敗國的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後，爲了確立戰後的領土關係，與交戰國簽訂的是恢復國際社會地位的條件。雖然日本承認放棄滿州、朝鮮、台灣、澎湖島等的主權，但並沒有表示這些主權歸還給哪些國家。

在這變局之下，日本被迫面臨選擇台北或北京的兩難困境，當時的首相吉田茂表面上採取「親美路線」，但考慮全球的局勢之下希望與台北、北京雙方建立友好關係。^⑦另外盟軍裡也對中國政策發生分裂，以經濟、香港問題爲考量而承認中共的英國與以戰略上的考量爲主承認中華民國的美國對立、妥協的結果，決定在舊金山條約中不邀請北京、臺北雙方。國共兩政府都聲明表示不滿，不過美方對台北暗示與日本建立單獨的和約。^⑧即使吉田茂抵抗美國的意向，當時被盟軍占領，以經濟振興爲優先目標的日本政府無法抗拒美國的意向，而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國民政府也面臨舊金山條約的生效，重新確認放棄要求日本賠償，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締結「中日和約」。「和約」是此後二十年間約束「中」日關係的大體架構。

關於戰後的中日關係史，最明顯的特色是突出的經濟問題的關心。依據入江昭，這過去一百年的中日關係是由「軍事」、「文化」等因素來規範，日本帝國主義崩潰後，經濟成爲「中」日關係的關鍵角色。^⑨戰後的「中」日關係是在亞洲的冷戰體制之下，警戒美國、中華民國的動向而展開。幸運的是，鑑於日本經濟的復興，盟軍與日方對貿易的重要性有共識。因此一九四六年貿易額達到二十億日圓，四九年則增加爲一千七百億日圓（當時五·一億美元）。^⑩

不過因爲「中」日關係沒有正式的邦交，而且爲了建立「中國圍堵」政策，受到嚴格的統制。雖然如此，一九五二年六月日本的三個政治家赴北京簽訂了「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之後，被稱爲「累積方式」的辦法是以實質上的「政經分離」政策^⑪來展開「中」日民間貿易。以後一九五三年十月簽訂「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一九五五年五月則簽訂「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在此情況下，限制內的貿易一直擴大。^⑫（參見表一、圖一）其他文化等的交流則透過日本的民間組織來展開「人民外交」。^⑬

註⑥ 周忠菲，*中美建交中的台灣問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

註⑦ 田中明彥，*日中關係一九四五～一九九〇*（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六～三八。

註⑧ 關於「中日和約」簽訂時臺北方面政策過程的研究參閱，殷燕軍，「吉田書簡と台灣」，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際政治*，第一一〇號，一九九五年十月，頁一七五～一八八。

註⑨ Akira Iriye,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1.

註⑩ *Ibid.*, pp. 94.

註⑪ 楊正光主編，*當代中日關係四十年*（北京：時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二七。

註⑫ 該時期的「中」日貿易受日美政府的壓力，「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只達到原計畫的五%，第二次爲三·三%，第三次爲六七%。參閱薛謀洪、裴堅章等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一九六～一九九。

註⑬ 在此指出的「人民外交」是對中共採取友好態度、擁有反美反帝意識的民衆所從事的民間交流。對「人民」的研究可參考，岡部達味，*現代中國の對外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一年），頁一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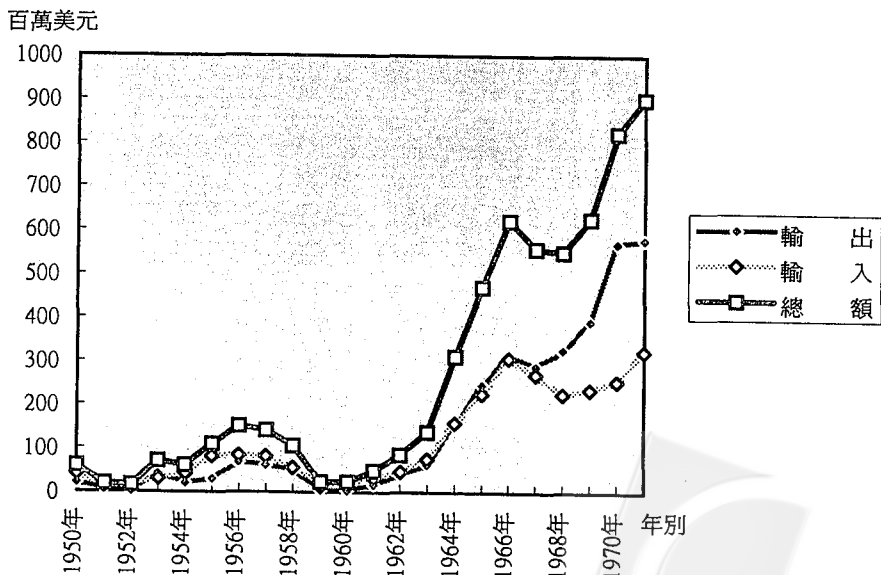
表一 日本對中共輸出入的演變，1950~1971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別	輸 出	輸 入	總 額	成 長 率
1950年	19.6	39.3	59.0	
1951年	5.8	12.6	18.4	-68.8%
1952年	0.6	14.9	15.5	-15.8%
1953年	40.7	29.7	70.3	353.5%
1954年	19.1	40.8	59.9	-14.8%
1955年	28.5	80.8	109.3	82.5%
1956年	67.3	83.6	151.0	38.2%
1957年	60.5	80.5	141.0	-6.6%
1958年	50.6	54.4	105.0	-25.5%
1959年	3.6	18.9	22.6	-78.5%
1960年	2.7	20.7	23.5	4.0%
1961年	16.6	30.9	47.5	102.1%
1962年	38.5	46.0	84.5	77.9%
1963年	62.4	74.6	137.0	62.1%
1964年	152.7	157.8	310.5	126.6%
1965年	245.0	224.7	469.7	51.3%
1966年	315.2	306.2	621.4	32.3%
1967年	288.3	269.4	557.7	-10.3%
1968年	325.4	224.2	549.6	-1.5%
1969年	390.8	234.5	625.3	13.8%
1970年	568.9	253.8	822.7	31.6%
1971年	578.2	323.2	901.4	9.5%

資料來源：日本關稅協會，外國貿易概況，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

圖一 日本對中共輸出的演變，1950~1971



資料來源：同表一。

雖然暫時接受「政經分離」方式，對北京而言最終的目標仍是「中」日正常化。因此與希望在「中日和約」的輪廓內擴大「中」日關係的日本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故面臨一九五八年三月簽訂「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時，鑑於其內容包括承認中共的五星旗升旗等帶著敏感政治性問題，岸信介內閣聲明不承認與中共建立政治性的關係。換言之，東京表達沒有意願提升與北京的關係，而引起中共強烈的反彈。

「中」日關係惡化的當時，五月二日在長崎市內一家百貨公司舉辦的中國物產展覽會上，右翼分子扯下了中共的五星旗，這是所謂的「長崎國旗事件」。五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再斥岸信介」批判岸內閣，同時外交部長陳毅宣布通商、文化關係的斷絕。^②八月「中」方對日本社會黨訪中團提出「政治三原則」表態，三原則為：^③(一)日本政府必須立即停止敵視中國的言行；(二)停止製造「兩個中國」；(三)不阻撓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後來「中」日關係直到一九六〇年一月締結了日美新安全保障條約時陷入僵局，不過中共也鑑於大躍進的失敗，被迫調整經濟政策，為了突破僵局，對日的態度軟化，八月提出貿易三原則，^④即為：(一)政府協定，(二)民間合同，(三)個別照顧，來修正「中」日關係。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廖承志（中日友好協會會長）與高崎達之助（前通產大臣）簽訂「備忘錄」，^⑤它規範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的「中」日民間貿易的輪廓，同時規定雙方設立代辦處。此一民間貿易實際上是半官方的性質，日本的代表是高崎(T)，中方的代表是廖(L)，因此被日方稱為「LT貿易」。^⑥這時期的「中」日經貿關係因「中」蘇關係的惡化，於是一九六五年對日本的貿易總額在中共的貿易夥伴中取代了蘇聯躍居第一名，接著中共因發生了文革，不僅與日本而且也和其他國家的關係發生糾紛。^⑦一九六八年把「LT貿易」改為「MT貿易」（Memorandum Trade；中共稱為備忘錄），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停滯的貿易額自一九六九年再度上昇。進入一九七〇年四月，隨著中共國際社會情況的好轉，中共進一步採取強硬態度，即為所謂的「周四條件」，意即與(一)援助台灣、南韓的公司、(二)投資台灣、南韓的公司、(三)提供戰略物質給美軍侵略印度支那半島的日本商社、(四)在日本的日美合資公司、美國小公司^⑧停止貿易。

另外政治方面，鑑於日美安保同盟的強化，中共對採取「親美路線」的佐藤榮作加以嚴厲的批評，所以無法有進一步的政治關係改變。

註^② 楊正光主編，當代中日關係四十年，頁一一八。

註^③ 同前註，頁一二二～一二三。

註^④ 同前註，頁一六二。

註^⑤ 它的性質為半官方式，當時的「中」日貿易由民間商社的「友好貿易」與LT貿易形成。

註^⑥ 池田誠、倉橋正直、副島昭一、西村成雄編，世界のなかの中日關係（東京：法律文化社，一九九六年），頁一七六。

註^⑦ 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四二〇。

二、一九七二～一九八八年：各方面交流擴大時期

一九五二年的中日和約以當時亞洲地區的冷戰為背景而成立。同樣「中」日關係的正常化，不是由於哪一方面帶頭努力的結果，也不是由於兩國經貿、文化交流以及「人民外交」發展的結果，無非是美國的政治、地理學上戰略變化的副產品而已。^①換言之，是陷入越戰泥淖的美國為了達成「名譽的撤退」，利用「中」蘇對立而接近中共的結果。

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後，以地下管道開始與中共交涉，進入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祕密訪問中國大陸而發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雖然佐藤內閣對中共關係的改善採取慎重態度，但是以「經團連」為主的日本經濟界裡有提昇「中」日正常化的期待。剛好美國宣布尼克森將訪問大陸，由於九月中加入聯合國，正常化的需求加速，經過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五月實現沖繩返還的佐藤內閣下台，總選舉後成立田中角榮內閣，朝野的訪「中」團陸續訪問大陸，進入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有關條件的折衝階段。^②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訪問中國大陸，二十九日發表聯合聲明而達成「中」日正常化。另外關於「台灣」的問題，^③大平正芳外相指出：「在聯合聲明中雖然沒有觸及日本政府的見解是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中日和平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並宣告結束。」^④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日立即發表「對日斷交宣言」，一九五二年以來的中日關係因而斷絕。^⑤正常化後的「中」日關係在聯合聲明中記載的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月、十一月以及一九七五年八月陸續締結貿易、航空、海運、漁業等各種實務協定。貿易穩健地增加，一九七二年的貿易額為約十一億美元，一九七八年則增加為約五〇·八億美元。（參見表二、圖二）

「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遲遲沒有進展。阻礙談判的原因除了周、毛的去逝造成了中共的權力交換期，日方也有田中金權醜聞事件等因素外，「中」日和平條約也刺激蘇聯想起「反蘇戰線」的「反霸權條款」。隨著鄧小平的復出、「中」美關係的進展、日方的讓步，終於在一九七八年八月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⑥

註① 增田弘、波多野澄雄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と中國*（東京：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二五四～二五五。

註② Akira Iriye,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p. 124.

註③ 緒方貞子著，添谷芳秀譯，*戰後日中・米中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八三～八八。

註④ 「中」日兩國關於「台灣問題」的處理，參閱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顧問委員會編印，*中共於國際雙邊關係中對台灣地位等問題的主張之研究*，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九六年三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五年），頁六〇～六一。

註⑤ 安藤正士、小竹一彰編，*原典中國現代史*，第八卷日中關係（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九四年），頁一三四。

註⑥ 林金莖，*戰後中日關係與國際法*（臺北：中日關係出版，民七十六年），頁一四五。

註⑦ 林金莖，*戰後中日關係與國際法*，頁二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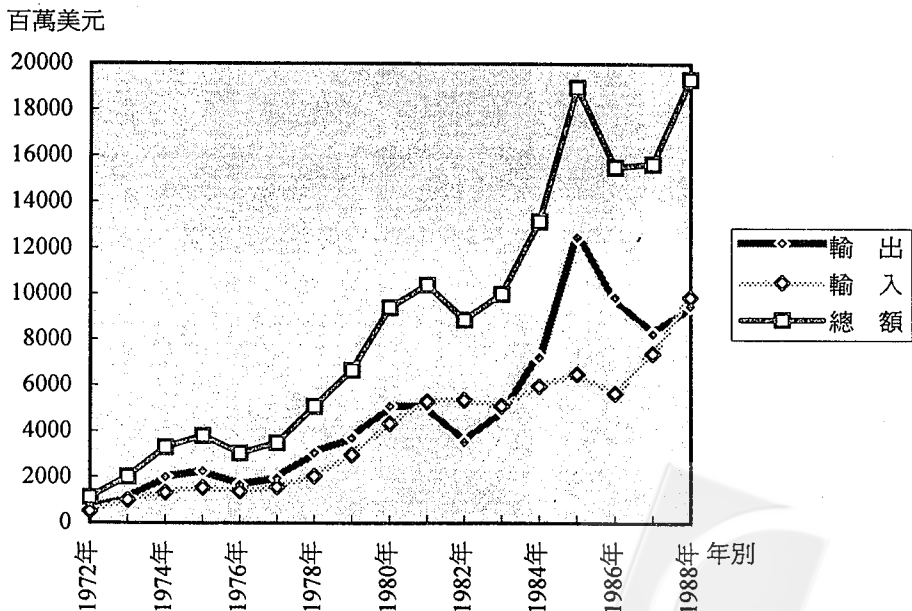
表二 日本對中共輸出入的演變，1972～1988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別	輸 出	輸 入	總 額	成 長 率
1972年	608.9	491.1	1,100.0	22.0%
1973年	1,039.5	974.0	2,013.5	83.0%
1974年	1,984.5	1,304.8	3,289.2	63.4%
1975年	2,258.6	1,531.1	3,789.7	15.2%
1976年	1,662.6	1,370.9	3,033.5	-20.0%
1977年	1,938.6	1,546.9	3,485.5	14.9%
1978年	3,048.7	2,030.3	5,079.0	45.7%
1979年	3,698.7	2,954.8	6,653.5	31.0%
1980年	5,078.3	4,323.3	9,401.7	41.3%
1981年	5,095.5	5,291.8	10,387.3	10.5%
1982年	3,510.8	5,352.4	8,863.2	-14.7%
1983年	4,912.3	5,087.3	9,999.7	12.8%
1984年	7,216.7	5,957.6	13,174.3	31.7%
1985年	12,477.4	6,482.7	18,960.1	43.9%
1986年	9,856.2	5,652.4	15,509.5	-18.2%
1987年	8,249.8	7,401.4	15,651.2	0.9%
1988年	9,476.0	9,858.8	19,334.8	23.5%

資料來源：日本關稅協會，外國貿易概況，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

圖二 日本對中共輸出入的演變，1972～1988



資料來源：同表二。

和平條約後十年的「中」日關係以經貿交流為主，一九七九～一九八八年的貿易額顯示更進一步的擴大。不過交流的擴大並不意味著政治問題的消除，在正常化時已解決的「歷史認識」、「台灣問題」卻成爲爭論的焦點。該時期的中心仍然是經濟問題，在此先探討「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

「中」日雙方在一九七八年二月簽訂的「『中』日長期貿易協定」重新開拓了「中」日間的經濟交流。同年七月、九月在日本經濟界發生了更期待的事件，即七月三井集團公司訪問北京時，李先念副總理向他們要求「貸款」，接著九月中共當局終於接受來自西德總額八十億馬克的貸款。

如此一來，中共建國以後鑑於軍閥、國民黨失敗的「貸款」經驗而一直採取的「自力更生」政策被推翻了。這段時間，忽然發生不尋常的「中」日貿易熱潮，如上海的寶山煉鋼廠等大規模合約不斷的簽訂。八月「中」日和平條約簽訂的時候，雙方已經內定大約五十億美金的成套機器設備的簽訂，此外有五十億美金的商談正在進行中。但是這熱潮是日本受到中共非現實的「洋躍進」近代計畫的擺布，故透過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中指責華國鋒的領導，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當局向日方提出保留一部分簽訂的契約，使日本經濟界受到衝擊。^⑧

面臨這危機，日本政府決定對中共採取進一步的經濟援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前首相大平正芳訪問北京時表示，願意提供三千三百億日元的巨額政府貸款給中共。（表三）同時對中共的經濟援助，大平首相擬定了「對中共經濟協力三原則」，即（一）與西方國家合作，絕不獨占中國大陸市場，（二）必須顧及其他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協國家之借貸平衡，（三）絕不從事軍事援助。^⑨這三原則是考慮到擔心日本援助減少的東協諸國與懷疑壟斷中國市場以及「中」日同盟的歐美諸國。

日本對中共經濟援助的政策是在一九八一年，中共對日本片面的宣布取消「寶山煉鋼廠」的成套設備的合約，所謂「寶山衝擊」之後確立，雖然「中」日雙方暫時互相批判而關係惡化，不過日本方面決定使中共重新履行取消的合約，再提供資金方面的援助。^⑩此後，日本對中共經濟合作成爲堅固的基本政策。

鑑於對中共經濟援助政策成爲「國家政策」，「中」日雙方最高領導的互相訪問也日常化。一九八二年五月趙紫陽訪日，對於「中」日關係的基礎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安定」的三原則後，進入「中」日新時代的期待之際，卻發生歷史教科書篡改日本侵華史實的事件，^⑪「中」日關係暫時倒退。中共召開「十二大」後，鈴木善幸首相訪「中」時，「教科書問題」不再成爲「外交問題」，短期內的「中」日間的摩擦消除。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胡耀邦訪日時，中曾根首相以趙紫陽提出的「三原則」再加上「相互信賴」改爲四原則。雙方共組「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一九

註⑧ 田中明彥，日中關係一九四五～一九九〇，頁一〇九。

註⑨ 朝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版一。

註⑩ 大約總額二千億日圓的貸款（包括商品、輸出銀行、民間金融機構貸款）。

註⑪ 楊正光主編，當代中日關係四十年，頁四三二。

表三 日本對「中」資金合作的演變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別	贈 與			貸 款	合 計
	無償資金合作	技術合作	小 計		
1979年		2.6	2.6		2.6
1980年		3.4	3.4	0.9	4.3
1981年	2.5	9.6	12.1	15.6	27.7
1982年	25.1	13.5	38.6	330.2	368.8
1983年	30.6	20.5	51.1	299.1	350.2
1984年	14.3	27.3	41.5	347.9	389.4
1985年	11.6	31.2	42.7	345.2	387.9
1986年	25.7	61.2	86.9	410.1	497.0
1987年	54.3	76.0	130.3	422.8	553.1
1988年	52.0	102.7	154.7	519.0	673.7
1989年	58.0	106.1	164.1	668.1	832.2
1990年	37.8	163.5	201.3	521.7	723.1
1991年	56.6	137.5	194.1	391.2	585.3
1992年	72.1	187.5	259.5	791.2	1050.8
1993年	54.4	245.1	299.5	1051.2	1350.7

資料來源：外務省經濟協力局編，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各年度版。

八四年三月中曾根首相訪中國大陸時談及第二次圓貸款問題（一九八四～一九八九年，四千七百億日圓）。

不過進入一九八五年中共的對方貿易逆差一直擴大，加上八月中曾根等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共的強烈反應。當時在中國國內因對日貿易逆差，加上經改進展所帶來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等因素的結合，造成了「九一八遊行」等的反日運動。但重視「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的當局不願意陷入僵局，「中」日雙方從大局的判斷來處理這「外交問題」。一九八六年九月藤尾文相因在文藝春秋發表「正統化韓國合併」而遭罷免，日韓雙方以抑制的態度來處理它。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的下台使「中」日關係的前途不明時，同年二月發生了「光華寮事件」，^④光華寮是在一九四五年以後京都大學的學生自治會的管理下開始自主管理，一九五二年中華民國獲得所有權，後來引起「中」「台」針對光華寮的所有權進行多次訴訟，一九八七年二月中共不滿日本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中華民國勝訴）而批判日本政府。但因考量整個「中」日關係的發展，「光華寮事件」逐漸平息，不過將來在最高法院判決時一定會引發爭論。另外同年發生的「東芝機械事件」，即由於日本對某些科技產品（尤其是可以轉用軍事的）禁運限制（對共黨國家），日本政府作出的一年（自一九八

註④ 參閱 Allen S. Whiting, 岡部達味と翻譯, 中國人の日本觀 (China Eyes Japan) (東京: 岩波書店, 一九九三年), 頁二二〇~二二六。

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起)禁止東芝公司向蘇聯等十四個共黨國家出口的決定,使中共蒙受不少的損失。不過在日方對中共採取特別措施後平息下來,不再成為問題。一九八八年四月奧野國土長官對「不適當發言」負責下台後,等待決定第三次圓借款(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五年,八千一百億日圓)的竹下首相訪華才使「中」日關係好轉。

三、一九八九年迄今：成熟時期

依據大陸學者,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這三年是中共最困難的時期。「六四風暴」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共實行制裁,接著蘇聯、東歐發生劇變,實施社會主義的中共面臨著嚴峻的形勢。^②

由一九八九年三月在西藏的暴動拉開序幕,接著因面臨胡耀邦的死亡,知識分子及市民向當局要求民主化而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中共派出軍隊鎮壓而引發「天安門事件」。全世界對此鎮壓行為嚴加批判、譴責,例如同年在法國舉行的 G 七會議中通過了「譴責中共之鎮壓民主化運動」、「停止對中共武器輸出」、「延緩世界銀行的重新融資」。^③雖然日本對此採取慎重的態度,但外務省在事件後的同月二十日決定凍結第三次貸款等新的經濟合作。鑑於亞太地區「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日方不斷地交涉關係改善的可能性,不過當時面臨日美貿易摩擦問題的高峰,日方無法「火中取栗」。在一九九〇年七月的 G 七高峰會議中提倡解除對「中」的經濟制裁後,日方決定在十一月解除第三次圓貸款的凍結。

一九九一年日方鑑於天安門事件、波灣戰爭的教訓,四月國會提出政府開發援助大綱後,另外也發表對中共的經濟合作,其內容為:(一)「中」日友好;(二)支援經改、對外開放政策;(三)推動以經濟發展為修正不均衡(地區間差距)狀態;(四)考慮人口、國土的規模。^④一九九二年初中共方面抓住鄧小平「南巡」的機會,進入快速成長的時代。不但與日本而且與東南亞及世界的依賴關係更深化了。「中」日之間的貿易額也持續上揚。(參見表四、圖三)一九九五年度的「中」日貿易額,根據大藏省的海關統計,總額達到五七八億五三一五萬美元,創下一九九一年來的新高記錄。除了一九九〇年因天安門事件因素而使貿易總額下降外,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每年度的增加率都超過了二〇%。另外,例如一九九四年度中共在日本的貿易夥伴國中位居輸出部門第六名,輸入部門第二名總額則為第二名,僅次於美國。^⑤

註② 周鏡整理,「中國在亞太面臨敵政治經濟形勢——研討會紀要」,現代國際關係,(北京)一九九五年第七期,頁二。

註③ 岡部達味、安藤正士編,原典中國現代史,別卷中國研究 Handbook(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九六年),頁四二二。

註④ 國際協力事業團,中國國別援助研究會報告書,提言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頁四。

註⑤ 一般而言,兩國之間的貿易統計可能會發生數字的不一致;不過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日貿易額的數字統計上差距很大,例如一九九四年日方的統計為八八·八億美元的逆差,不過中方同年的統計卻有四七·四億美元的對日逆差,雙方的統計數字高達一三〇億美元的以上的差距。可以解釋的理由是經由香港的商品因處理方法、計算方法而有差距,以及商品依據「原產地主義」、「最終進口地主義」的原則計算也有數字的差異。隨著中共經濟的國際化以及需求加入 WTO 的過程中,日方盼望重新以國際共同的標準作為檢討貿易順逆差的依歸。參閱服部健治,「日中經濟交流の緊密化」,小島朋之編,アシア時代の日中關係(東京:The Sinul Press,一九九五年四月),頁一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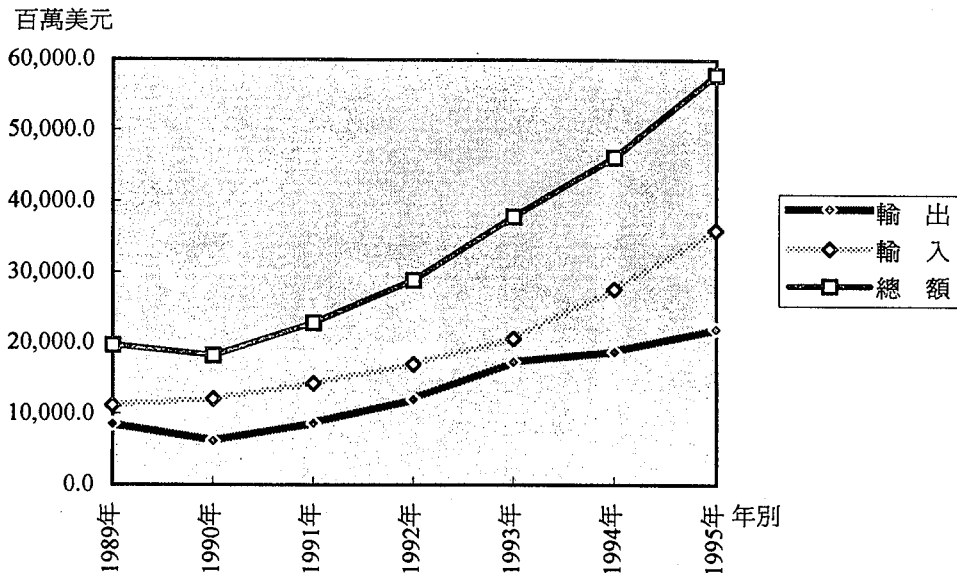
表四 日本對中共輸出入的演變，1989~1995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別	輸 出	輸 入	總 額	成 長 率
1989年	8,515.9	11,145.8	19,661.7	1.7%
1990年	6,129.5	12,053.5	18,183.0	-7.5%
1991年	8,593.1	14,215.8	22,809.0	25.4%
1992年	11,949.1	16,952.8	28,901.9	26.7%
1993年	17,273.1	20,564.8	37,837.8	30.9%
1994年	18,681.6	27,566.0	46,247.6	22.2%
1995年	21,931.0	35,922.0	57,853.0	25.1%

資料來源：日本關稅協會，外國貿易概況，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

圖三 日本對中共輸出入的演變，1989~1995



資料來源：同表四。

政治方面，雖然日本抗議中共一九九二年二月在「領海法」中記載「尖閣諸島」（釣魚台）是中國領土，不過四月江澤民仍然訪日，接著爲了紀念「中」日正常化二十周年，歷史上首次日本天皇和皇后訪中國大陸，在友好的氣氛之下，「中」日關係似乎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一九九三年八月細川政權在施政方針中提及過去的「侵略戰爭」得到中共的「好感」時，雙方似乎回到天安門事件前的友好狀態。不過一九九三年十月中共再次核子試爆後，每日新聞在社論中非難中共之試爆，^④「中」日關係出現陰霾。

雖然一九九五年五月村山首相訪中對「中」日戰爭表示「反省」，六月在部分在野

註④ 每日新聞，一九九三年十月七日，版三。

黨缺席以及不少的反對票下，通過「戰後五十年的決議」後，「中」日關係仍然一直低落，反而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一九九五年，中共展開大規模的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等的政治宣傳。^⑧另外中共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月、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月不斷地進行核子試爆，「中」日之間在情緒上及情感上的摩擦增加。受到中共一連串的核子試爆及日本國內強烈反應，日本政府採取制裁行動。一九九五年五月的試爆後，日方說明：「鑑於ODA四原則，削減無償援助的一部分」。^⑨在同年八月試爆後，日方又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即凍結除了人道援助外的一九九五年度無償援助。^⑩日本政府內出現暫時擱置對中共貸款等的強硬論調，但是根據中共以後的行為，「貸款重新考慮論」將成爲「中」日之間的新爭論點是不能否定的。

國際方面的風波也影響了中日關係。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總統訪美後，「中」美關係、兩岸關係極端的冷卻、緊張化。中共從一九九五年夏天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的總統選舉時期不斷地向台灣進行「文攻武嚇」，造成了「台海危機」，導致美國派遣艦隊，它卻帶來了高代價的後果。如從去年一直動搖的「日美安保」關係反而加強，將其體制由「遏制蘇聯」轉向應付「遠東緊急事態」。^⑪另外，引發與中共存在著南海問題的東協國家，警戒將來該地區的中共霸權主義，走向強化團結以牽制中共。

四、小 結

回顧戰後的「中」日政治、經濟關係，如入江昭教授指出「經濟」的突出是無法否定的。不過在(一)一九四九～一九七一年的無邦交時期，(二)一九七二～一九八八年的交流擴大時期，(三)一九八九年後成熟的成熟時期的經貿關係與政治關係關聯程度並不太一致，在此探討各期的特性。

一九四九～一九七一年，自中共政權成立到「中」日正常化的無邦交時期，日方一直以實質上的「政經分離」方式從事民間貿易而確保與中共交涉管道，中共雖然事實上接受「政經分離」方式，但有時依據政治的策略，有時又根據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而著手「中」日貿易。另外隨著中共當局採取激進路線，而且當時的（特別是一九五〇年代）日本在中共貿易夥伴中並不是最重要、絕對的角色，再者貿易總額極少，所以經貿關係較易受政治的影響而波動是該時期的特色。

總體而言，該時期的「中」日關係在無邦交以及「不正常」狀態的前提下進行，因此由於互相缺乏信賴，無法建立鞏固的「兩國」關係。如此受到中共的政治變動，每每使日本方面倍感困惑。等到中方政治運動的平穩化以及對日態度的軟化，日方才寬慰地鬆一口氣，這時期的政經關係就在如此情形下反覆進行著。

註⑧ 小島朋之，「戰爭勝利五十年で對日批判」，東亞，一九九五年十月，頁五一。

註⑨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版一。

註⑩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版一。

註⑪ 劉江永，「美日重建冷戰後同盟」，世界知識（北京），一九九六年第九期，頁三。

一九七二～一九八〇年，雖然「『中』日正常化」受到雙方人民廣泛的支持及歡迎，但是兩國領導的意圖有相當的差距。日方以田中角榮主張的中國問題是內政問題為代表，他指出：「如果解決中日問題就可以消除三分之二的國內的矛盾。」^①換言之，達成「正常化」是優先問題，並沒有站在國際的視野來考量。中方是以「霸權條款」為代表，中日友好關係儘量利用中蘇的對立，充滿了策略性的色彩。如此一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預想落空，「正常化」後六年才簽訂。

和平條約後，政、經、文各方面的交流活躍化（一直擴大）。中共走向改革開放政策後，日方開始對中共貸款等的經濟合作，成為「中」日關係的基礎，逐漸出現雙方努力建立互相信賴的友好氣氛。不過「歷史」問題等的糾紛不斷地發生，使「中」日關係如被澆冷水一般，阻礙了進一步的「長期穩定」關係。不過「中」日雙方站在「中日友好是雙方的利益」的立場，以及對中共而言，儘量降低經濟的變動對日的影響。因此該時期的貿易、資金合作穩定地增長。

由於天安門事件，日本方面也與歐美步調一致，對中共加以經濟制裁而「中」日關係惡化。同時大陸人民偽裝越南難民的「偽裝難民事件」，在日本的中國大陸人民犯罪情形不斷地發生，讓日本人的中國觀轉變為「不健全的中國人」的新中國觀。

進入後冷戰時期，除了天皇訪「中」等象徵的友好以外，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的交流增加使雙方互相依賴關係深化。歷史、台灣問題等陳舊的爭論點外，日本的政治大國化、中國的經濟大國化以及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認識等，與簽訂「正常化」及「和平條約」時期不同的內外環境，對「中」日關係產生了微妙的影響。不過在日方多數仍然同意「確保中共的發展是日本的利益」^②的情況下，即使發生政治問題，也無法推翻日「中」關係的基礎。中共也受到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達成目前的高成長，雖面臨台灣、西藏、人權等「國內問題」時採取強硬的態度，但絕對避免孤立自己的行為，因此在大架構下的「中」日關係雖然抱著潛在的爭論點，仍然穩定地展開。茲將一九四九年以來迄今的各時期中的政治特性及經貿特性歸納如下：

時 期	政 治 特 性	經 貿 特 性
1949~1971	1.「中」日無邦交，缺乏互相信賴。 2.中日和約制約「中」日關係的發展。	1.民間貿易為主，總額微少。 2.50年代易受到政治的變動。 3.60年代隨著「中」蘇對立，「中」日貿易一直擴大。
1972~1988	1.「中」日正常化，結束不正常狀態。 2.「中」日和約，促進政經、文化各方面的發展。 3.歷史等的問題不斷的發生。	1.日方對中共經濟援助的開始。 2.貿易總額爆發的增加。

註① 早坂茂三，早坂茂三「田中角榮」回想錄（東京：小學館，一九八七年，頁二二〇～二二四）。

註② 朝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八日，版二。

1989~迄今	1. 天安門事件，對「中」制裁。 2. 天皇訪華促進友好關係。 3. 核子試爆導致雙方的摩擦。 4. 出現中國威脅論、日本的政治大國化問題。	1. 「南巡」後雙方互賴關係的深化。 2. 日方對「中」逆差一直擴大。
---------	---	--

肆、分 析

在這章的論點是對「中」日之間政治事件、經濟事件與貿易總額的變動加以分析。中共建政後不久的一九五〇年，中共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二年因日本與中華民國建交的關係，「中」日的貿易關係發展直到「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簽訂才好轉。「第一次」簽訂的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持續地增加，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停滯，因中共陷入激進政策，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三年間因大躍進政策以及「中」日關係斷絕往來的影響，貿易總額明顯地下降。六十年代雖然中共陷入文革的波折，但是除了革命外交過火的數年以外，「中」日貿易呈現成長的狀態。LT 貿易簽訂的一九六二年達到八千四百五十萬美金的總額，「正常化」前一九七一年增加為九·〇一億美金（約一〇·七倍）。（表五）

表五 1950年～1971年「中」日大事記、貿易總額的演變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別	事 件	貿易總額	成長率
1950年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59.0	
1951年	締結舊金山條約	18.4	-68.8%
1952年	第一次日「中」民間貿易協定，中日和約	15.5	-15.8%
1953年	第二次日「中」民間貿易協定	70.3	+353.5%
1954年	中美相互防衛條約	59.9	-14.8%
1955年	第三次日「中」民間貿易協定	109.3	+82.5%
1956年	〔蘇聯當局史大林批判〕	151.0	+38.2%
1957年	岸信介首相訪台、美	141.0	-6.6%
1958年	長崎國旗事件	105.0	-25.5%
1959年	日本社會黨團訪「中」	22.6	-78.5%
1960年	日美新安保條約簽訂	23.5	+4.0%
1961年	（美蘇高峰會議、蘇共第22屆黨大會）	47.5	+102.1%
1962年	LT 貿易署名	84.5	+77.9%
1963年	中共的「中日友好協會」成立	137.0	+62.1%
1964年	中共核子試爆	310.5	+126.6%
1965年	（美軍攻擊北越）	469.7	+51.3%
1966年	日本的「中日友好協會」分裂	621.4	+32.3%
1967年	水爆實驗、日本四名報紙記者放逐	557.7	-10.3%
1968年	MT 貿易署名	549.6	-1.5%
1969年	日美聯合聲明（表示台灣、韓國的確保）	625.3	+13.8%
1970年	周四條件的提出	822.7	+31.6%
1971年	季辛吉訪「中」，發表尼克森訪「中」	901.4	+9.5%

六十年代「中」日的貿易沒有受到中共國內政治變動的理由可歸因於：(一)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與美國對立的情況下，日本是唯一可回應中共需求的貿易夥伴（一九六五年日本取代蘇聯成爲中共最大的貿易夥伴）；(二)與中共國內政治因素有關，鑑於經濟政策的失敗後，和五十年代後期不同，對日本不再提到「政經不可分」，而接受實質上的「政經分離」的方式。

「正常化」後的雙方經貿關係在「和平條約」簽訂後，量、質兩方面都提昇了。以貿易總額來看，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的停滯現象是由於「洋躍進」政策失敗後的緊縮政策所造成的，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的停滯是爲了減少中方的對日貿易逆差的擴大，抑制進口日本的電器製品等的消費財。除了這兩個時期外，貿易總額不斷地增加下的一九七二年爲十一億美金一九八八年則達到一九三·三億美金。（表六）

表六 1972年～1988年「中」日大事紀及貿易總額的演變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別	事 件	貿易總額	成長率	資金合作
1972年	「中」美緩和、「中」日關係正常化	1100.0	+22.0%	-----
1973年	雙方大使到任	2013.5	+83.0%	-----
1974年	簽訂「中」日貿易、航空、海運等實務協定	3289.2	+63.4%	-----
1975年	四人幫抬頭、「中」日和平條約交涉陷入僵局	3789.7	+15.2%	-----
1976年	周、毛死亡、放逐四人幫	3033.5	-20.0%	-----
1977年	文革終結、鄧小平復出	3485.5	+14.9%	-----
1978年	簽訂「中」日和平條約、鄧小平訪日	5079.0	+45.7%	-----
1979年	大平首相訪「中」，決定日圓的貸款	6653.5	+31.0%	2.6
1980年	華國鋒訪日，第一回日「中」閣僚會議	9401.7	+41.3%	4.3
1981年	寶山衝擊、決定對「中」金融支援	10387.3	+10.5%	27.7
1982年	趙紫陽訪日、鈴木善幸訪「中」、歷史教科書問題	8863.2	-14.7%	368.8
1983年	胡耀邦訪日，提出四原則	9999.7	+12.8%	350.2
1984年	中曾根訪「中」，決定對「中」第二次貸款	13174.3	+31.7%	389.4
1985年	中曾根內閣閣員參拜靖國神社	18960.1	+43.9%	387.9
1986年	中曾根再訪「中」、藤尾文相發言不當遭罷免	15509.5	-18.2%	497.0
1987年	胡耀邦下台、「光華寮事件」	15651.2	+0.9%	553.1
1988年	竹下登訪「中」，決定對「中」第三次貸款	19334.8	+23.5%	673.7

該時期「中」日經濟關係的特色是「平等互惠」的精神，因爲先進工業國日本與發展中的中共之間的貿易關係容易陷入「工業日本、原料中共」的非對稱的關係，因此中方傾向於慎重地避免「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關係，日方也鑑於過去的侵略而擔心「中」方的態度。該時期的經貿關係在數字上順利發展，不過也有基於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的差異所引起的問題。例如：一九八五年「中」日貿易不均衡的高峰時（中方的對日逆差大約六十億美元），與靖國神社問題結合後成爲大規模的反日運動。

「洋躍進」政策取消成套設備的合約，所謂的「寶山衝擊」，暴露了改革開放初

期不成熟的經濟營運與政治對經濟政策的影響。當然，對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決定包含了「戰爭賠償」的意涵，但是日本決定經濟合作的原因是戰略的考量。

總體來看，該時期的中共對日本而言是「成為我國援助最重點的國家之一」。^③該時期中共擺脫天安門事件所帶來的外交困境後，進入高成長時期。「中」日之間的政治關係除了天皇訪問中國大陸外，不斷地出現摩擦，尤其日本的政治大國化、中共的經濟大國化等的日「中」競爭現象，尋找國際生存的獨立路線、達成民主化的「台灣」的抬頭等等逐漸出現並動搖「中」日關係。

不過「中」日關係已經成熟不易受到政治變動的影響。雖然一九九三年以後的「中」日政治關係並不是很順利，但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度的每年貿易額的增加率超過二〇%。（表七）一九九四年朱鎔基訪日時指出：「鑑於「中」日兩國的潛在能力，雙方的貿易總額可成為三千九百億美金的規模（當時貿易總額的十倍）。」所代表的樂觀的預測，加上日本方面國內的經濟不景氣，大陸的高度成長以及相關法律逐漸完整，大陸市場開放等的關係，日本對中共的經濟建設參與繼續增加。

表七 1989年～1996年「中」日大事紀、評價及貿易總額的演變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別	事 件	貿易總額	成長率	資金合作
1989年	天安門事件，凍結圓貸款	19661.7	+1.7%	832.2
1990年	決定解除對中共圓貸款的凍結	18183.0	-7.5%	723.1
1991年	海部首相訪「中」	22809.0	+25.4%	585.3
1992年	中共公布領海法、江澤民訪日、天皇首次訪「中」	28901.9	+26.7%	1050.8
1993年	中共再次核子試爆、細川發言	37837.8	+30.9%	1350.7
1994年	兩位大臣對南京大屠殺等事件發言不當而下台，細川首相訪「中」	46247.6	+22.2%	-----
1995年	中共兩次核試、對台文攻武嚇、日方凍結無償貸款之一部分，村山首相訪「中」	57853.0	+25.1%	-----
1996年	台海危機、日美安保條約再加強、釣魚台事件	-----	-----	-----

對約半世紀的「中」日關係，吾人提出兩個命題：(-)「中」日經貿關係只是為了經貿利益，而與政治無關？或者隨著政治關係變動？另外，有沒有政治目的，有的話有哪些呢？(二)在「中」日經貿關係中，經濟策略術能不能活用？

首先在前面看過的結論是「中」日經貿關係並不是為了經貿利益，而是在政治的、策略的考慮下進行。無邦交時期的日本一直在中日和約的架構內追求經貿的利益，不過「中」方將對日貿易視為「『中』日正常化」的手段，故薄弱的雙方關係容易受到政治變動的影響。六〇年代後因為中共在國內外的困境，不得不放棄以策略的觀點來看

註③ 外務省編，經濟協力局編，我が國の政府開發援助，下卷（東京：國際協力推進會，一九九四年），頁九八。

「中」日貿易，而採取以實際利益的觀點來看「中」日經貿關係。

正常化後隨著「中」日關係的深化，日本對中共經貿政策也帶來戰略的色彩。對中共施行政府開發援助無非是具有戰略性的政治目的。而日本對中共經援的政治目的可以歸納為三個：

(一)促使中共繼續開放政策：日本的政治意圖是以「封閉的中國不如開放的中國」為基本的態度推動對「中」經濟外交。對以經濟發展至上，在改革開放下的中共了解到沒有國際的協調也就沒有國內經濟的發展，所以中共也希望目前安定的國際秩序。

(二)促進「中」日友好合作關係：日本的經援對中共的現代化有貢獻，使中共深具「好感」，對「中」日關係的發展有利。

(三)促進中共的民主化：回顧韓國、台灣的发展模式，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的多元化，進而實現政治的民主化，鑑於中國大陸的人口、教育、經濟水準、國土等條件，無法令人相信中共在短期間走向政治民主化發展，不過，至少可以期待中共會持續參與國際社會的活動。

「中國脅威論」是假想經濟大國化的中共將成為軍事大國化為前提，不過以鄰國的立場而言，真正的「中國脅威論」無非是經濟發展的停滯引起國內的不穩定，進而導致混亂、強權、內戰的中國。為了避免悲劇的發生，日本應該積極地參與中共的現代化建設。

另外鑑於近年來中共在南海、台海的強權行為，在日本以貸款凍結的手段來威嚇中共的意見逐漸出現。以 Economic Statecraft 的理論來看「中」日經濟關係，日本站在施予國的角色，而中共是目標國的角色。擁有豐富的資金、高科技的日本向中共施行經濟制裁有没有效呢？

筆者認為並沒有效。在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時期最流行的不是「中國脅威論」而是「中國崩潰論」時，北京一方面忍耐日歐美的制裁，一方面開拓與周邊國家（印尼、星、韓）的關係來等待世界潮流的變化。雖然日本的對中共經濟合作（資金、技術等）是中共達成現代化建設時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但是如果「中」日關係陷入極度惡化，中共一定會尋找其他的夥伴或者與其他國家推動關係改善來克服僵局。

在天安門事件、核子試爆時日方進行部分的制裁，這只是日本政府的表面上的姿態而已，因為在釣魚台問題惡化中的一九九六年秋天，池田外相主張「支持中共的改革開放路線，日本的經濟合作是重要的」^⑤的認識下，走向解除「部分的制裁」。所以日本的對「中」經貿關係確實有政治意圖。按照 Hirshman 的理論，日本對「中」的經濟策略術的目標接近於在第二節中提到的四個經濟策略術的目標中的第(二)項使目標國的政治體制的改變為目標，不過其意圖與美國改善目標國（Target Country）的某些行為的目的不同（例如：改善中國壓抑人權的政策），雖然對只擁有經濟大國稱號的日本，無法像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利用國家力量威壓中共（不論有没有效），而且也无法改變中共的體制，或利用施壓使中共停止核子試爆等的行為，但是貸款等的手段

註⑤ 每日新聞，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版二。

可以使中共對日本採取友好的政策，促使中國繼續開放政策，換言之，日本達成間接的政治意圖。（表八）

表八 政治意圖與政治效果互動關係表

		政 治 效 果	
		有	沒 有
政 治 意 圖	有	A 經濟外交成功	B 經濟外交失敗
	沒有	C 意外結果	D 政經分開

對中共而言，日本並不是威脅中共生存權的國家，反而吾人認為不論日本的動向如何，中共的經濟發展是必然的趨勢，故以「交易方式」(Exchange Statecraft)來進行交往，不僅對日本，而且對中共都明顯地享有利益。實際上對日本而言，參與中共的經濟改革是「一石兩鳥」的良策，一方面「經貿立國」的日本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環境，另外也可確保將來的潛在的大市場。

伍、評估與展望：代結論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中」日關係時，除了歷史、台灣等陳舊問題外，吾人提出三個關鍵問題，即為一、雙方重新認識「中」日兩國的非對稱性，二、認識到世界裡的「中」日關係，三、日本積極參與中共的現代化建設。

雖然「中」日之間的非對稱性在「正常化」時雙方已經確認過，不過建交後的「中」日間的不少的糾紛是由所謂的「非對稱性」所引起的。日本是信奉民主主義，採取自由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中共是共黨獨裁之下邁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中國家。另外，雖然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擁有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傳統，但是在近代日方卻成為侵略國家，中國成為被侵略國家。因此在雙方對中日非對稱性存在的認知下，全力以赴地建立對等、平等的關係。

中共領導經常向日方引用「我們同文同種…」的語句把「中」日關係傾向於定義為「特殊的兩國關係」。日方也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國家對中共加以制裁時，以「日中關係」的特殊性為理由，當初採取消極的態度而受到內外的批評。鑑於這些教訓，進入後冷戰時期日本逐漸以國際社會的「日中關係」來思考兩國的各种問題。「中」日關係以經貿的規模、政治的影響力來考量時，絕不只是兩國的問題，而是亞太地區、全球規模的問題，換言之，「中」日兩國不斷地意識到兩國關係的演變對該地區政治、經濟的影響來進行交往。所以如人權問題等與日本的利益沒有直接關聯的問題，也應該站在身為尊重民主主義的西方先進國家的成員立場，以譴責核子試爆般的嚴

厲態度來面對中共。^⑤

進入後冷戰時期，隨著中共擺脫內外困境而恢復國際地位，「中國威脅論」忽然出現。由於世界銀行的誇大報告（它暗示經濟大國的中國），並且中共近年來對南海以及自李總統訪問美國後在台灣海峽一連串表現了強硬的態度，讓「威脅論」越來越具說服力。在日本國內，擔憂對中共經濟援助會導致「養虎為患」，成為日本的威脅，故為了阻止這最惡劣的情況，主張放棄干預政策而採取遏制政策來教訓中共。不過在理論與事實上，均無法達成對中共的遏制。在此情況下，經濟繼續成長的中共，在短期時間內可能無法實現民主社會，但在也許其權威體制變成「軟性權威主義」而走向統合主義的道路的認識下，幫助他們的不是「和平演變」，而是「和平改革」、「寧靜革命」明智的措施。

另外以中共的發展是必然的趨勢的認識下來看「中」日關係也是需要的，在地緣政治學上，永遠跟中國離不開的日本應該更繼續實行貸款等的經濟援助。雖然中共不少的領導有「日本幫忙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當然」的認識，^⑥日方不一定認同前述看法，不過還是積極推動經援。即使對中共提供經援，中共達成現代化，雙方在情感上仍然存有隔閡，然而當日本停止對中共的經援，雙方的關係更形惡化。意即日本的對中共經援，不但可以減少雙方的歷史情結的情感摩擦，而且可以建立雙方的信賴關係。如果當日本停止對中共的經援，雙方的情感摩擦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

日本的經濟援助有助於中國大陸的發展，雖然隨著世代的交替，新一代的日本人民對中國的「罪惡感」也逐漸地薄弱，但日本國內仍然認同對中共的援助是「中」日友好關係的基礎。中共也認清放棄向日本要求賠償的事實，接受日本「報答恩情」的經濟援助，認識目前的日本與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的差異，如此一來短期、長期內深化互相信賴而建立真正的友好關係。

面臨二十一世紀的「中」日關係就如同在五〇年代初、七〇年代初一樣是一個再定義的時期。在這認識下，中日兩國的關係不是以十年、二十年的時間來思考，應該是百年、兩百年的宏觀的眼光來考慮，為了子孫世世代代的繁榮一起共同奮鬥。

*

*

*

註^⑤ 日本國內仍然濃厚的存在「核子過敏」的情緒，故對中共的「核試」顯示格外強烈的反應。

註^⑥ 鄧小平語，朝日新聞，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版一。

